

任务也不同,因而应该分开来进行研究,所以他自己开设选修课时就列为语言风格学、汉语语体学两门课程,尤其是他认为语体具有可规范性,风格重在创新不具有规范性的观点,振聋发聩,给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思路。他在八十年代提出的语体风格的“制导因素”和“物质因素”,也为日后的研究开启了一条新的思路。

李熙宗老师的语体学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注重继承望道先生的学术遗产。他在2009年的《当代修辞学》(原《修辞学习》)上发表的长篇小说《语文体式与语体的关系及其实践运用》,就对望道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语文体式的概念进行了充分的阐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语文体式在“语体及其体系的建立,语体实现对具体语言运用的制导中”都起着“接口”作用的重要观点,认为可以将语文体式作为语体类型划分的最低层级,认为“语体学研究深入到语文体式的层面,把语文体式(语言体裁)的研究作为语体学研究的固有任务和内容,这不仅有着语体学理论研究上的重要价值,并且对增强语体学理论的语言实践功用更是有着积极的意义”。信哉此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老师与袁晖教授共同主编的那本《汉语语体学概论》,可以说是当代语体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影响之大,是任何一个想步入语体学研究的人所绕不开的。既有理论深度,是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又明白易懂,很适合作为教材向莘莘学子们传播。斯人已去,语体学风格学的研究仍在浩浩前行,但是他留下的关于语体风格的真知灼见,将会不断地在今后的研究中熠熠闪光。

(刘大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公关语言”研究：“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探索的先声*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16.06.011

中国修辞学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其中之一可以说就是“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学”的兴起。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这一转向,固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有关,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其实也是中国当代修辞学界几十年来理论探索的一个逻辑发展。

—

恩格斯说过:“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学”研究范式的形成首先源于当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2002年,根据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等一系列案例,我们发表了《突发危机管理的一个语用学分析——兼论语言学的研究视界》,提出“外源性突发危机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面子管理”问题,由此决定了“一个国家在突发危机时如何有效地说话的语用原则”,2003年,根据“非典事件”中有关部门的话语问题,我们又发表了《实话如何实说:突发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的政府信息发布——危机管理的语用分析之二》,提出“内源性突发危机管理”的核心是“社

会动员问题”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语用原则。2010年,我们专门举办了“第一届国家形象修辞学学术研讨会”。之后连年召开,迄今已经六届,仅仅我们的学术团队,从2014年起,就先后分别在语言学、传播学、政治学中获得了四项有关“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而中国修辞学会在会长陈光磊教授的主持下,从2012年的学术年会起,连年将“国家形象修辞”列为年会学术讨论的基本主题之一。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当代修辞学》也从2013年起开设了“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学”专栏。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也开设了“国家形象的修辞与传播”专栏。

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这一转向,自然直接来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与西方语言学的“政治语篇研究”“批评语言学”“话语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等理论的影响有关。不过,这其实也是中国当代修辞学界理论探索的一个逻辑发展。而导夫先路的学者中就有复旦大学的李熙宗先生。

二

李熙宗先生是当代语体学、语言风格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不但撰写了一系列专论,还与袁辉、丁金国等先生发起了“语体学、语言风格学研究系列研讨会”,主编了《语体论》等文集。不过,他在其他领域的创新性研究却也由此多少被遮蔽了,其中就包括“公关语言”的探索。

中国传统修辞学一向关注的首先是文学的语言艺术,关注的是个人的话语,关注的是词句层面的所谓“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辞格的运用”。但是,这一研究范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开始受到了一部分新的探索的有力挑战,其中包括《言语交际学》(刘焕辉,1986)、《幽默语言学》(胡范铸,1987)、《人际关系语言学》(姚亚平,1988)、《公关语言艺术》(孙莲芬、李熙宗,1989)等等。

如果说《幽默语言学》只是对“何为幽默”“何为语言幽默”“语言何以幽默”集中进行讨论;《人际关系语言学》只是侧重于从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建构集中考察人际关系与语言交往之间的互动;那么,刘焕辉先生的《言语交际学》则可以说在中国语言学界第一个明确试图将言语交际的全部过程纳入语言运用研究的视界,显示了语言研究尤其是修辞研究“方向性的转折”的可能;而李熙宗先生与夫人孙莲芬合著的《公关语言艺术》则直接标志了中国修辞研究从首先关注个人话语到首先关注机构话语的重大转变。

《公关语言艺术》是我国第一部将“公共关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的著作,正式出版之前,在大学课堂上先行用作讲义,引起了强烈的回应。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影响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

该书分为10章,分别为:第一章“公共关系与语言”、第二章“公关语言运用的一般原则”、第三章“公关人际传播语言的基本特征”、第四章“人际传播方式中常用语言技巧”、第五章“公关实用文体的语用特点”、第六章“广播、电视语言运用的特点”、第七章“重视外观形象的魅力”、第八章“商业、服务行业的语言艺术”、第九章“谈判的语言艺术”、第十章“广告的语言艺术”。

《公关语言艺术》出版以后,在社会上声誉鹊起,首版12000册一销而空。其后,各种稿约纷至沓来,于是,作者又先后出版了《公关语言教程》(李熙宗、孙莲芬、霍四通,1998)、《公关语

言教程》(李熙宗主编 2008)。不过,在修辞学界,《公关语言艺术》的理论价值似乎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关注,尽管有书评专门指出:“当代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语言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地带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试图建构新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对公关语言的研究正是这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孙莲芬、李熙宗合著的《公关语言艺术》作为这种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它的成功标志着开拓公关语言这一新领域已经取得了初步硕果。”但我们以为,该书对于当代修辞学理论发展的意义迄今却并未获得显豁的揭示。

三

那么,《公关语言艺术》的理论意义究竟是什么?择其要者,大略有三:

第一,传统修辞学首先关注的是个人之间的语言交往,而《公关语言艺术》则是国内最早关注“机构”之间的语言交往的著作之一。我们曾经指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网络社会,一方面,人越来越“去原子化”,被组织进各种“机构”(国家、企业、学校、社团、社区等等),由此,不但需要借助“机构”而存在,同时也受制于“机构”而活动;另外一方面,社会公共空间越来越发达,人的利益越来越需要借助公共空间而实现,这样,机构之间的语言交往、机构与个人之间的语言交往的价值便无可避免地日益凸显。在《公共语言艺术》中,尽管作者尚未明确使用“机构话语”或“机构修辞”的概念,但所谓“公关”即“公共关系”,则“公关语言”运用语言“沟通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关系,在双方的相互适应中使组织求得更好的发展”本身就已经显示了对于“机构话语”的空前关注。

第二,传统修辞学首先关注的是语言的“修饰”,以至于即使试图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的修辞学著作今天依然将“得体”视作“修辞的最高原则”。我们曾经批评:“得体不是修辞的最高原则”,因为,第一,从理论看,“体”不是一个简单的指标,而是不同参数的集合,“体”与“体”之间常常会发生冲突,因此,必得有更高的原则加以管辖;第二,从实践看,“不得体”而成功的言语行为更是不乏其例。“修辞的最高原则应该是合意,也就是意图的有效实现”。而重读《公关语言艺术》,我们发现,在1980年代,该书在讨论“公关语言运用的一般原则”时,一共讨论了四项:“立诚”“切境”“得体”“有效”。今天我们不难看出,这里尽管也强调“得体原则”,但是,却是将其列为“立诚”“切境”“得体”“有效”四项原则中的一项。而从“立诚”“切境”“得体”原则到“有效”原则,既可以看做是言语行为实施过程的一种时间性特征,似乎也有意无意地蕴含了这是言语行为原则的一种层递性关系。

第三,传统修辞学首先关注的是文学的语言,因此,其引证的思想资源多半也局限于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公关语言艺术》则直接关注海外的“公共关系学”“大众传播模式论”“广告心理学”等等理论,由此提炼出了“人际传播语言”“大众传播语言”“体态语”“接近”“说服”“应急”“退拒”等等新的话题。这不但在同样年资的学者中是难得的,对于后来的青年学者也是很有启示的。

可以说,由于学科发展的局限,《公关语言艺术》中的思想探索虽然尚未清晰地“范畴化”,也尚未建立一个逻辑严整的工具性范畴系统,但所讨论的话题与采证的理论资源,却已经与传统修辞学的面貌殊为不同,预告了一种新的可能。

“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学”就基本假设而言,认为“修辞不是语言的修饰,而是人类运用语言以实现自己意图的一种行为过程”,就根本目标而言,是由修辞分析入手,推进机构与机构的对话,推进机构与公众的理解,最终推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就研究对象而言,关注的是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对话、国家与公众的对话、机构与社会的对话,就涉及语体而言,包括政治语言、新闻语言、法律语言等各个语言领域;就研究方法而言,也绝不限于“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辞格的运用”,而是在将“修辞”看作是一个“运用语言以有效实现自己意图的行为过程”基础上,充分调动各种语言的分析手段,并采用案例分析、实验测量等一系列方法加以考察。^①由此,它很难说是上世纪八十九年代“公关语言学”的简单升级,不过,却可以说是“公关语言学”思想逻辑在新世纪的一种回应。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条件下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修辞学案例库建设研究”(批准号16BZZ001)阶段性成果。

注 释

胡范铸《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专栏主持人语,《当代修辞学》2013(4)。

胡范铸《突发危机管理的一个语用学分析——兼论语言学的研究视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6)。

胡范铸《实话如何实说:突发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的政府信息发布——危机管理的语用分析之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6)。

王蕊《国家形象修辞是当代修辞学的重要课题——第一届国家形象修辞学学术研讨会述评》,《当代修辞学》2010(6)。

《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80周年、〈当代修辞学〉创刊30周年暨中国修辞学会2012年学术研讨会将在义乌举行》,《当代修辞学》2012(5)。

国家教委“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语言学咨询报告》,见刘焕辉《言语交际学》后记,《言语交际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

董达武《开拓新领域的硕果——简评孙莲芬、李熙宗的〈公关语言艺术〉》,《修辞学习》1990(2)。

孙莲芬、李熙宗《公关语言艺术》,知识出版社,43页。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商务印书馆,2004。

胡范铸《言语行为的合意性、合意原则与合意化》,《外语学刊》2009(4)。

①胡范铸《幽默语言、谎言、法律语言、机构形象修辞、实验修辞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6)。

(胡范铸 金志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065)